

东吴名家·周闻道

在场写作：创作与理论的呼应

周闻道

摘要：文学流派的诞生，至少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独特的美学观念、严密的理论体系；二是要有足够的作品与之互动呼应。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呼应和依存。按照文学流派产生的一般规律，当是作品在先，理论总结概括和流派命名在后，其间穿插一些自己的创作审美追求。历史上的建安文学、明公安派、清桐城派等，莫不如此。“在场主义”的流派诞生却具有反逻辑特点：理论先于作品，即它是“三苏”故里四川眉山一批对散文葆有热情的作家，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散文界既百花齐放、众声喧哗，又标准失范、莫衷一是的乱象，在对中国散文流变史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按照“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散文”的理想和自觉意识，进行系统性、学理化的审美定位、价值确定、规范建立，以及哲学本体论、文体本体论、写作方法论的构建等；然后，再以在场主义审美标准和价值尺度，寻找和进行创作实证的呼应。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自觉的散文流派”，它的创立并非简单地为一群人的写作提供总结，还肩负起廓清中国散文乃至文学的天空，为中国散文立论和立法（法则—尺度）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在场主义”；审美本位；文学流派；建安文学；公安派；桐城派

有个问题，在“在场主义”诞生之初就被人提出：“在场写作，应注意创作与理论的呼应。”

应该说，提出的这个问题，除了出于对“在场主义”发自肺腑的关心与爱护外，还真是切中要害的内行之言。常言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该问题的“内行”之处在于，它不仅抓住了一个新生成的文学流派要立足的关键：既要有独特的美学观念、严密的理论体系，又要有足够的作品与之互动、呼应；还抓住了“在场主义”所具有的迥异于通常文学流派诞生的反逻辑特点：理论先于作品。

这里所谓的反逻辑，是针对文学流派理论

与创作关系的命题。正常的逻辑是：先有创作（作品），再有理论——文艺理论乃关于文学本质特征、创作规律、社会功能及审美取向等的形而上学说，具有规律性、普遍性、指导性和理论性特征；而文学流派，则是作品与理论趋同性的互动和呼应，是理论和创作融合的绚丽花朵。因此，文艺理论在本质上是对文艺创作与批评实践的系统总结，其核心内容包括对文艺本质的界定、创作过程的溯源、审美特征的鉴别、发展规律的探寻，以及对“意象”的捕捉与创造、写作主客体的文化融合、作品艺术表现形式等的解析；再进一步而言，则包括对创作哲学本体

论、文体本体论、写作方法论的建构等。

回到文学流派,按照“360文库”的解释,这是在文学创作中因为审美观念、创作理念、题材倾向和表现手法趋同而形成的一类文学形式或类型。这里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理论和作品,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互相呼应和依存。

因此,按照文学流派产生的一般规律,也当是作品在先,理论总结、概括、提炼在后,即先有一定地域、一定时期的部分作家,在创作上形成了大量在“审美观念、创作理念、题材倾向和表现手法”上具有趋同性的作品,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进而有人进行特征寻找、理论概括、审美定位,逐渐形成带有流派性质的理论总结和命名。西方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地探讨美学和文艺的理论专著——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文论代表作《诗学》中的“悲剧理论”与“摹仿的艺术观”,是在总结当时大量的文艺作品之后形成的;后来古罗马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的《诗艺》和朗吉努斯(Longinus)的《论崇高》等,则是在进一步总结新的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对亚里士多德文论的扩展和丰富。柏拉图(Plato)在阅读了大量文艺作品后,不仅重新审视了亚里士多德“摹仿的艺术观”,还指出其“三大罪状”:不能反映真理,以虚构谎言亵渎神明,迎合人的情。俄国19世纪的现实主义理论也莫不是在总结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y Gavrilovich Chernyshevsky)、杜勃罗留波夫(Nikolay Dobrolyubov)、别林斯基(Vissarion Grigoryevich Belinsky)等代表作家作品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提炼的结果。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汉末至魏初的建安文学、盛唐的边塞诗派,到散文史上的明公安派、清桐城派,以及“五四”前达到极盛的鸳鸯蝴蝶派等,无不是这样。

—

先看建安文学的产生及命名。

东汉末年,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导致土地兼并加剧,豪强争夺,士族割据,互相倾轧,兵荒马乱。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政治进入至暗时期,曾经物华天宝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呈现出“白骨蔽平

原”“千里无鸡鸣”^①的凄凉景象。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在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时,纵火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强驱百姓西行,“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②可见,以张角为首的黄巾军揭竿而起,是社会矛盾外化的结果。

面对这种举国彻苦的现实,一大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并未置身事外。他们以强烈的担当意识和勇敢的在场精神,用文字介入身边的苦痛,创作出大量不朽的诗篇。先是自发的、偶然的、个体的创作,比如曹操的《度关山》《苦寒行》《观沧海》,曹丕的《燕歌行》《大墙上蒿行》《上留田行》,曹植的《泰山梁甫行》《薤露篇》《送应氏》等。除了“建安三曹”,还有“建安七子”:王粲、孔融、陈琳、徐幹、阮瑀、应玚、刘桢。

逐渐地,人们发现,这些诗文都有一些共同的风格和特点,比如在内容上有强烈的现实介入感,紧贴时代,真实地反映了社会战乱、人民的苦难及其思想情操;在体裁上以五言诗为主,也有四言、杂言等;在境界上意境宏大、笔调舒朗、开阔俊逸、自由洒脱,抒发了渴望国泰民安的忧思和建功立业的壮志,也流露出人生苦短、壮志难酬的悲怨;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雄健深沉、慷慨悲凉、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特点;在表现手法上言从心出,直抒胸臆,以诗性本真语言表现了汉末社会现实及人文思想。有人把这一现象和特点,概称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尤以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之论最为精到:“怛悵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③其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便形成格调劲健、具有艺术感染力的“风骨”。因这一文学现象发生在东汉末年汉献帝时期,年号为建安,故后人在总结该现象和作品风格时,将其命名为“建安文学”。

① [清]沈德潜选评,袁啸波校点:《古诗源》,第124、10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

②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武传点校:《三国志》,第85页,武汉:崇文书局,2010。

③ [梁]刘勰著,郭晋稀注译:《文心雕龙》,第266页,长沙:岳麓书社,2004。

再看明代公安派的产生和命名。

公安派是明后期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主要代表文人为“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高、成就最大,袁中道次之,袁宗道再次之。公安派的产生方式,介乎建安文学与“在场主义”之间,既受当时文坛乱象的催生,以及一批文坛精英的觉醒与介入,也有观念与创作的呼应。

公安派的诞生,与“在场主义”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明弘治以来,文坛即由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王世贞、李攀龙为代表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奉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以致谬种流传,“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①。针对文坛这股陈腐复古之风,由袁宗道首先自发地发难,袁宏道举旗,袁中道推波助澜,兴起了一股反对承袭,主张通变,追求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推重民间通俗文学的文体变革浪潮。他们认为,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在文坛上剽窃成风、众口一辞,其根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②。事实上,“古何必高,今何必卑”^③“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④。因此,他们响亮地提出反对承袭、主张通变之说,坚持“世道既变,文应因之”^⑤“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⑥。他们不仅主张文章内容应当与时俱进,而且表达方式,包括叙事和语言也应自然质朴;在艺术风格上追求性灵写作,要求叙事风格清新活泼,率性本真,轻逸灵动,通透清新。换用在场主义散文观念来说,这就是书写的本真在场,即追求汉语本我表达的极致之美,以本真的语言,表达本真的对象与发现,实现“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将变矣”^⑦“信腕信口,皆成律度”^⑧。

在创作呼应上,公安派也做足了功夫。公安派的创作成就以散文为主,包括抒情和叙事散文、随笔、游记、小品、尺牍等,也有部分小说和诗歌。在性灵写作理念的影响下,公安派的创作追求文章的灵动疏朗、真情实感,认为:“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⑨以袁宏道初至西湖所写散文为例。这是一篇山水游记,写作背景是作者利用卸任之后、赴新之前偶得的短暂空隙,开启畅游东南山水之旅。西湖是其游历地

之一,这也是其首游西湖。全文围绕“初游”与“西湖”展开,以记叙展现游览踪迹,用素描渲染西湖美景,以介入激发内心感悟,情和景水乳交融。文章最难是本真,此文也尽显公安派标榜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艺术风格。文中“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⑩等语言,不暇择词,脱口而出,自然而率性;笔墨所传递的是一位身经宦海沉浮、俗世之累的官员在偶得的超脱中生发的怡然晓畅之情。

公安派的兴起,一扫明代文坛前后七子以来的“王、李雾气”,促进了文体解放,唤起了文坛久违的活力与生机。但在其晚期,也出现浅率化抒写闲情逸致的流弊。这一点,颇像“在场主义”诞生之前,由于受近百年郁达夫、周作人小(小品文)、美(美文)观影响,中国散文出现的抒情变滥情,小品变小视野、小格局、小气象,缺席于时代,过度沉湎于个人狭隘的内心世界的状况。

由于“公安三袁”都是明时湖广省公安(今湖北省公安县)人,后人以地域命名,对这一文学现象以“明公安派”指称,并将其视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散文流派。

清代桐城派的产生和命名也是如此。

与公安派的命名一样,桐城派也是以地域命名的,但在其发展早期,并没有“桐城派”这一

- ① 许嘉璐主编,章培恒、喻遂生分史主编:《明史》第9册,第5850页,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 ② [明]袁宗道:《论文下》,吴调公主编,王骥等选注:《公安三袁选集》,第6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 ③ [明]袁宏道:《丘长孺》,吴调公主编,王骥等选注:《公安三袁选集》,第295页。
- ④⑧ [明]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吴调公主编,王骥等选注:《公安三袁选集》,第245、246页。
- ⑤ [明]袁宏道:《江进之》,吴调公主编,王骥等选注:《公安三袁选集》,第298页。
- ⑥ [明]袁宏道:《叙小修诗》,吴调公主编,王骥等选注:《公安三袁选集》,第230页。
- ⑦ [明]袁中道:《〈花雪赋〉引》,吴调公主编,王骥等选注:《公安三袁选集》,第368页。
- ⑨ [明]雷思霈:《潇碧堂集序》,[明]袁宏道著,钱伯诚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下),第169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⑩ [明]袁宏道:《西湖一》,[明]袁宏道著,钱伯诚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第4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二

名称,其间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作为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櫟等;其核心理论是倡导古文变革,强调“义理、考据、词章”结合,主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①。

桐城派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明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即已兴起,“能振笔为古文词者,代有传人”^②。这一点,与“在场主义”产生于眉山极为相似。两宋时期,眉山有 886 人考取进士,史称“八百进士”。宋仁宗因此感叹为何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州。桐城在明清的文化氛围中,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精英。他们以不同的文化体悟、文学创作与文化研究及发现,让一个文学流派的诞生水到渠成:先是明末清初的方以智、钱澄之等人倡导古文振兴,形成了桐城派早期的文化基础;继而戴名世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③思想,不仅让古文振兴的文脉继往开来,还为桐城派的“义法理论”奠定了审美观念的基础。1644 年,清兵入关,为巩固统治地位,推重程朱理学,这让方苞领导的古文运动所倡导的“文统”“道统”“治统”理念,因得到了官方认可而如鱼得水,“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④。方苞在《读〈史记〉八书》《书〈史记〉十表后》中正式提出了文章“义法”说;自《南山集》案中解脱后,他对“义法”说又作出了进一步阐释和完备。加之桐城地处安徽“外江内湖”的优良环境,风俗醇厚,为流派的形成提供了清正雅洁的文化土壤。

在创作呼应上,桐城一地在明末已有古文创作基础,编辑出版了《龙眠古文初集》,收录 90 余位作家,形成了文化兴盛、文学观念活跃与文学创作繁荣的良性互动。后来,方苞按照“义法”说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尺度,于 1733 年编成了《古文约选》《古文辞类纂》等选本,其影响延续 200 余年,为“义法”说提供了散文创作的示范文本。自此,不仅“义法”说受到文坛重视,桐城派也成为有一个鲜明的文学主张、审美取向、理论构建和创作呼应的文学流派。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历城周永年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⑤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

“在场主义”的诞生,却恰恰相反——它是理论先行的,所以谓之“自觉的散文流派”。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散文界曾喧哗一时的“新散文”“元散文”“原生态散文”“历史文化散文”“小女人散文”,等等,之所以通常被称为“现象”,而不是“流派”,就在于它们还不具备成为文学流派理论体系和作品呼应特征。其中,“源于对先锋性、探索性和实验性的强调,‘新散文运动’特意使用了‘新散文’这一概念,以示与散文传统即‘十七年’散文和 20 世纪 80 年代散文的决裂”^⑥。但是,自从 21 世纪初“新散文”这个概念一出现,就饱受争议,其焦点是关于概念的命名,明显带有随意性、即兴性,显失严谨性、规范性、学理性。什么是“新”,什么是“旧”?标准是什么?如果以时间为标准,那么昨天相对于今天就是“旧”;如果以内容为标准,“新散文”概念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四白话文学运动初期。周作人在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序言中强调:“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⑦因此,

① [清]姚鼐、[清]王先谦选编:《正续古文辞类纂》,第 348 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② [清]张英:《龙眠古文初集序》,[清]张英撰,江小角、杨怀志点校:《张英全书》(上册),第 299 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

③ [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第 6-7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④ [清]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清]方苞:《望溪先生全集》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222 册,第 11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⑤ [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一四),第 204 页,长沙:岳麓书社,2011。

⑥ 刘军:《“新散文”20 年:命名的赋新及理论标举的疏漏》,《当代作家评论》2022 年第 1 期。

⑦ 周作人:《现代散文导论(上)》,蔡元培等:《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第 192 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在场主义”同仁(“在场主义”诞生前为眉山作家群体)与《十月》《美文》《当代文坛》《散文·海外版》联手,于2005年11月在眉山举办了全国首次以“中国新散文批判”为主题的学术交流会。这次会议不仅标志着眉山作家群体自觉的散文意识的觉醒,而且按照MBA教程中“枪打出头鸟”的“市场准入”原则,通过对当时众声喧哗中声音最响的“新散文”的“破”,为“在场主义”的诞生提出了客观上的现实呼唤——既然“新散文”是一个伪命题,要“破”,那么怎么“立”?或者说,什么样的散文,才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散文?

这个问题是这次参会的专家提出来的,既是问活动主办方,又是问每一位参会者。这一问,问出了思考,也问出了行动,让本来就热闹非凡的散文界,再次“风乍起,搅动一池春水”。对于一个从说话就开始,经历了漫长的散句、散体文、骈体文、俚体文发展,到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就已出现的文体概念——散文,这个洋洋数千年仍然身份不明、界限不清、标准失范、评判不一的文体,要在我们手里解决这一系列的复杂问题,谈何容易?这不仅责任重大,而且难度系数非凡。眉山散文同仁经过认真审慎地评估,清醒地认识到:仅凭眉山散文团队自身的实力,无论是理论积淀还是文学修养,都很难如愿。于是,大家经过反复比选,聘请了著名文艺理论家、“非非主义”创始人、先锋诗人周伦佑先生加盟并担纲执笔,历时近3年,通过从源头到流变的全面梳理,终于确定了在场主义散文流派的命名,构建了一整套与之相关联的哲学本体论、文体本体论和写作方法论,并以《散文:在场主义宣言》的形式,于2008年3月8日发表于“天涯社区—散文天下”。

《散文:在场主义宣言》的发布,标志着在场主义散文流派的诞生。这是眉山作家群体按照散文意识的觉醒,以及自己对散文的理解和理想,先构建自觉完整的在场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然后,再以在场主义散文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尺度为指导,寻找和进行创作实证的呼应。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逻辑,或曰“逆生子”。按照民间的说法,“逆生子命硬克父母”。似乎“在场主义”也应验了这个说法,它一诞生就以振聋发聩之

声向世界宣告:

——蒙骗了几亿中国人近百年的“先秦散文”伪概念,将在在场主义的光照下不击自溃,烟消云散;

——统治中国散文界近百年的“广义散文”谬说,将在在场主义的锋芒下土崩瓦解,寿终正寝;

——最后,“散文性”的揭示和最终确认,散文精神的深度论证,以及一个包括本体论、方法论和自成一体的话语表述系统的散文本体论的建立,将彻底改变散文无边际、无标准、无本质特性确认的混乱状态——中国散文几千年来身份不清,来历不明的暧昧状况将因为我们而得到澄清。

我们还散文以自由,散文因我们而正名。^①

三

“在场主义”作为“文学史上自觉的散文流派”,既有如上所述的所有文学流派的共性特征,又有其独特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审美本位。“在场主义”旗帜鲜明地表明以“在场写作”为终极价值,这在文学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二是理论体系。“在场主义”一开始就以“在场性”为核心,包括作家的在场与写作的在场,构建了一整套完整而严密的哲学本体论、文体本体论和写作方法论。这一点,许多文学流派也没有做到。三是观念“自觉”——自觉地寻找、发现、解决散文的问题,自觉地构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散文审美标准,自觉地追求“在场写作”。这是“在场主义”与其他文学流派在产生形式、流程和先天成熟度上最大的区别。

总之,“在场主义”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散文的众声喧哗中,一批对散文既葆有热情,又保持理性和冷静的作家和文艺理论

^① 陈剑晖主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散文现象》,第293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家,在对身份不明、界限不清、担当丢失、评判失范的中国散文乱象产生警醒的自觉后,通过在源头流变上对中国散文的前世今生进行认真梳理,寻找到的一种自己心目中“散文应该有的样子”,进而为其立法立论。对此,《散文:在场主义宣言》说得很清楚:“‘在场主义’命名,不是为一群人的写作寻求暂时的总结,而是要为中国散文的未来开启新的开端。”“‘在场主义’绝不满足于把自己局限于一个散文流派,它还自觉地肩负起廓清中国散文的天空,为中国散文立论和立法(法则—尺度)的历史使命。”

因此,一个“自觉”——“中国文学史上自觉的散文流派”,既彰显了“在场主义”的理性高度和先天发育的成熟度,又意味着对其在理论建设与创作呼应上的特殊使命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为了求证这种创作呼应,我们沿着中国散文的流变史向前追溯,追溯到第一篇具有完美在场精神的散文——屈原的《渔父》;追溯到先秦《郑伯克段于鄢》,战国《邹忌讽齐王纳谏》,西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过秦论》,唐代《阿房宫赋》,宋代《醉翁亭记》,明代《卖柑者言》,清代《狱中杂记》……并由此确认:所有有价值的传世之作,都承载了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记忆,都饱含作者对书写对象的审视、介入与发现,都是在场的。

当然,最重要的创作呼应还是在当代。

“在场主义”同仁深知,一个成熟的散文流派,不仅要有鲜明的审美观念、科学完整严密的理论构建,还必须要有足够的与其文学观念相呼应的作品佐证。于是,从《散文:在场主义宣言》发布之日起,他们便有意识地组织全国志同道合的在场同仁,自觉地按照在场理念进行创作实验,先后出版了一系列“在场主义”的年鉴、选本、书系、丛书、获奖作品选集,加上关涉“在场主义”的大中学教材、文学史等,共计68部1800余万字。其中,“在场主义散文奖”按照本流派的价值尺度,以民间立场和非体制化、去中心化的方式,寻找符合流派特征的在场作品,与在场理论互动呼应,先后成功评选六届,并寻找到百余部(篇)作品,如:

林贤治的散文集《旷代的忧伤》收录作者39篇散文随笔,书写的都是古今中外著名的知

识分子,有外国的布鲁诺(Giordano Bruno)、左拉(Émile Zola)、托尔斯泰(Leo Nikolayevich Tolstoy)、葛兰西(Antonio Francesco Gramsci)、惠特曼(Walt Whitman)、凯尔泰斯(Kertész Imre)等,也有我国大家耳熟能详的鲁迅、顾准、李慎之,等等。作者以自己的书写介入他们的生命际遇和精神气质:“为我们描绘了众多思想者的画像,勾勒了一幅人类自由精神的价值谱系。”作者说他之所以对在场主义文学观表示认同,“因为‘在场’这个多少带有存在主义意味的外来语词,它所意含的现实性、个人性和介入性,与我一贯崇尚的文学观念颇相一致”。^①

齐邦媛的《巨流河》作为非虚构文本,以始终如一的精神在场姿态,用文字介入特殊历史年代的个人史、家族史与民族史,用知识女性委婉俊雅的语言,通过对自己和父母两代人在一个大动荡、大变动时代亲身经历的无尽漂泊的记述,从个体的经验出发,抵达家族的命运沧桑、国家和民族苦难的大命题,表现了作家独立面对历史和当下社会的严肃思考与始终不渝的赤子之心。^②

高尔泰的《寻找家园》是带有自传性的散文集,作品以第一人称的身体在场姿态,讲述了自己从孩提时代见到家乡的美好,到流放西北在鬼门关附近徘徊的苦难经历,用一生的漂泊不定来诠释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作者举起手中刀一样锐利的笔,依凭内心诚实和良知的尺度,剖开历史纷繁喧哗的表象,还原了那些让人战栗的生活细节和生命历程。

眉山是“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故里,自来文风鼎盛,散文渊源深厚,唐宋八大家中眉山一地占三家。“在场主义”诞生于眉山,有其历史的必然。但“在场主义”不只属于眉山,还属于整个散文界和文学界。因此,“在场主义”一经面世,立即引起了全国文学界和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新浪网、网易网、搜狐网等数十家网站转载了《散文:在场主义宣言》(媒体称之为“眉

① 杨宇、梁波:《〈旷代的忧伤〉获散文民间奖 林贤治得30万奖金》,凤凰网, https://culture.ifeng.com/whrd/detail_2010_11/09/3045036_0.shtml, 2010年11月9日。

② 参见《文坛扫描》,《文学教育》2011年第10期。

山宣言”)，众多作家、评论家和读者发表评论，全国20多所大学文学院组织了专题研讨。目前，“在场主义”散文流派已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绕不开的重大事件，引起海内外文学界的高度关注。有专家认为，“在场主义”的诞生是继21世纪初“新散文”运动后，汉语散文写作中又一重大事件，是眉山继“三苏”以后第二个文化群体高峰，也是在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和开拓性质的文化事件。《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散文现象》《四川当代散文史论》等，对“在场主义”均有专章专节介绍；两个版本的《大学语文》收入了该流派文章。

文化的穿透力，往往会超越其本身的界域，“在场主义”正是这样。“在场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观念，正成为影响整个中国散文和文学乃至文化发展的新锐元素。

从“在场主义”出发，山东泰安一中在语文教研中提出了教育在场，标榜为“在场——一种语文教育的存在论立场”。某金融机构在员工培训中，根据对“在场主义”的认识，引申出“银行服务的第三只眼”的话题，即银行服务过程中的在场第三方视角。北京天作房地产开发商提出了“空间在场主义”理念，主张应站在住户立场，从人性化的情感贴近出发，设计和布局房屋空间。在广播领域，有人利用在场性原理，探讨广播有声语言“虚境化”下所表达的美学特征，认为“在场性”和“不在场性”的美学特征，是在虚境化广播语境要求下，对有声语言时间和空间意义的提升。^①在行政诉讼中，有人提出行政参与的“在场性”要求，认为正式听证与“陈述及申辩权”平等是“在场性”的核心保障。2012年10月17日，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办事处20多名公务员，更是宣布放下案头工作，用两个小时集中学习当代先进文化——“在场主义”。2014年秋举办的深圳首个文学季的主题便是“探索在场的文学表现方式”。^②“中国诗歌网”开宗明义地宣称：“‘在场’是所有基层诗人的写作基石或者说命脉……让新大众文艺群体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特征和强劲的生命

力。”^③2025年北京市举办大型阅读活动，主题便是“文学在场，北京漫行”。“在场主义”在美国国家和港澳台文学界，也有广泛影响。

在场主义理论与创作的呼应，是在场主义散文流派建设的永恒课题，期待更多朋友的参与——既参与作品的创作，也参与理论的探索和丰富。我们以宽广的胸怀拥抱世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文学评奖’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24BZW13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闻道，作家，经济学家，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华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乐山师范学院客座教授、“在场主义文学创作研究中心”顾问，在场主义散文流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当代中国创立文学流派的政府官员。已出版散文和非虚构文学作品15部460余万字、文艺理论评论作品3部80余万字、经济学专著3部100余万字，主编在场主义散文流派专著38部1160余万字。获四川文学奖(两次)、冰心散文奖、孙犁散文奖、刘勰散文奖、中国报告文学奖、中国新散文奖、西部散文奖、苏东坡文学艺术奖等。作品被收入多个版本的《大学语文》、人教版高中教辅材料及数十种全国性散文年选、选本。《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散文现象》《四川当代散文史论》对在场主义文学和周闻道均有专章专节介绍。

-
- ① 李元红：《“虚境化”语境下广播有声语言表达的美学特征》，《发展》2012年第6期。
- ② 参见周闻道：《梦是阳光在场的形式》，银河悦读网，<https://www.yinheyuedu.com/article/detail/3141>，2017年9月27日。
- ③ 刘江伟：《“泥土里写诗，沙砾中开花”——大众写作让诗歌走向万家灯火》，中国诗歌网，<https://www.zgshige.cn/c/2025-06-23/29134567.shtml>，2025年6月23日。